

商务印书馆

主编 刘东

中國學術

总 第三十三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11 No.1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

中國學術

送金



总第三十三辑

主编 刘 东

商务印书馆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 第33辑/主编刘东.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101-1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82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封面题签 饶宗颐

ZHONGGUO XUESHU

中国学术

总第三十三辑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101-1

2013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3

定价:36.00元

主 编：刘 东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万俊人（清华大学） | 巴斯蒂（法兰西学院） |
|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 | 王邦维（北京大学） |
| 王晓明（上海大学） | 艾尔曼（普林斯顿大学） |
| 田浩（亚里桑那州立大学） | 刘禾（哥伦比亚大学） |
| 刘东（清华大学） | 刘迎胜（南京大学） |
| 宇文所安（哈佛大学） | 瓦格纳（海德堡大学） |
| 张伯伟（南京大学） | 安乐哲（夏威夷大学） |
| 李明辉（台湾“中央研究院”） | 李伯重（清华大学） |
| 苏源熙（芝加哥大学） | 李零（北京大学） |
| 杜德桥（牛津大学） | 杜瑞乐（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
| 陆扬（北京大学） | 杜赞奇（新加坡国立大学） |
| 陈平原（北京大学） | 陈来（清华大学） |
| 周锡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 孟悦（多伦多大学） |
| 姚大力（复旦大学） | 胡志德（洛杉矶加州大学） |
| 荣新江（北京大学） | 贺萧（圣克鲁兹加州大学） |
| 倪梁康（中山大学） | 唐晓峰（北京大学） |
| 秦晖（清华大学） | 钱乘旦（北京大学） |
| 高毅（北京大学） |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 |
| 阎步克（北京大学） | 葛兆光（复旦大学） |
| 滨下武志（京都大学） | 德里克（俄勒冈大学） |

© 商务印书馆 《中国学术》
第十一卷 第一辑 总第三十三辑

卷首语

正待补写这篇“卷首语”，却见一位年轻的同事撰文指出，在当今中国的社科期刊界，存在着各种“被颠倒的”关系。简单说来，由于官僚机构的强力介入，使得“学术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评价机构”、“网络平台”、“管理部门”、“市场效益”、“学术研究”等等的关系，全都倾斜向了不利学术的方面。——而读罢此文，如果再屈指一算，又会发现这份吃尽辛苦的刊物，在上述那架大大失衡的天平上，竟样样都处于高高翘起的、被委屈的一方。

不过，我们并不因此而觉得沮丧，甚至连感到“委屈”都没有工夫。恰恰相反，正因为所有的是非高下，全都被颠倒过来了，才更让我们越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坚持有多么重要。——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位同事也同时指出了理想的办刊状态，而那恰好也正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正因为这样，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直到自己现在的这种“跟不上形势”，在此后对历史的不断校准中，终于又显出某种“先见之明”来！

论文栏第一组，接着讨论伯林的写作活动。刘东继续来处理“自由与多元”的难题，他从伯林交叉重叠的多重认同出发，并参验着中国语境的独特体验，来重新解读这只“跨文化的狐狸”，并提出这位英国思想家的内在逻辑，毋宁在于“跨文化→人类学→不可通约的多样性→选择的优先性→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文章由此判定，只有从一元论的僵化定势出发，人们才会以己度人地误以为，伯林注定要在“观念的冲突”中走投无路，这无异于抱怨“狐狸为何不是刺猬”；殊不知，伯林早从多元论的思考习惯出发，通过“以观念叠加观念”的方法，逐步筑起自己思想的制高点。而基于这种灵动的立场，上两种观念在某些要点的部分重叠，就并不自动意味着彼此全盘覆盖。毕竟，在既有的思想体系中，“自由”概念并不等同于“多元”，因为

它暗含着来自西方文化的诸多前理解,而“多元”主张也并不归属于“自由”,尽管它有时还要乞助于前者的起码保护。由此,伯林毕生学术工作的首要意义,在于他通过反复试错而演示:在文明与文明相互叠加的边缘地带,在文化与文化相互解构的全球时代,到底有哪些价值要素是最不能放弃的,——别管它们来自哪个具体的文明,也无论现有体系能否一次性地完成对它们的理论论证。简森·费雷尔详细考察了伯林采用随笔方式来写作政治著作的性格和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写作方式本身的优劣:一方面,这种写作方式充满了探索性、提示性和个人性,从而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促使后者去进一步思考讨论的主题;当然另一方面,这种文体也限制了论证的完整性和立场的一致性,这也是伯林经常为人诟病之处。进而,作者又利用这一考察的结果,来探讨伯林对于自由主义的辩护,并认为这跟他对哲学的看法和对随笔的使用有关。在伯林看来,哲学问题并不能用经验或逻辑方法解决,它本身就带有模糊性,并不要求不可证伪的笃定答案。而随笔这种形式,和多元主义的主张一样,都跟对于哲学的此一理解相合。此外,随笔的文体还适合于下述目的:并非要对自由主义进行完整和系统的论述,而要通过对于反自由主义理论的证伪,来提示性地、却非一劳永逸地捍卫自由主义。

第二组的两篇文章,宏观考察了东亚地区的近代及当代。从全球史的角度,彭慕兰述评了东亚地区的“早期近代”问题。此前的研究认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关系演变,尤其在十八世纪,不过是欧洲文明输入的结果。可越来越多的学者却意识到,上述地区的近代化,更倚靠其内部模式,而其经济发展,亦得益于亚洲内部的贸易模式和劳动分工。虽然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早期,东亚的很多地区从总体上是停滞或衰退的,但这些地区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发展,却同它们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早期的飞跃式成功,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作者提出,尽管当前的研究尚不能确切支持对于“东亚发展模式”的假设,但如果看到东亚地区的人口增长,和它从十六世纪起长达两百年的生活水平提高,曾在历史上造成过某种“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这种增长方式,又同它在1945年后的二次发展,有着不可分的因果关联,那么,把东亚放到世界史之中,并认为它自有其“早

期近代”，也就自有一番道理。放眼于世界范围，德里克围绕“民族国家建立”与“公民权斗争”之间既不可分割又若即若离的关系，历史地考察了东亚国家内部“民族国家建立”与“公民权斗争”之间的特殊性。作者指出，由于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现代性过程被大大压缩了，导致国家的建立与民族意识的建立同处在一个过程。这样，公民权问题就与民族和国家的建立夹杂在一起，并在国家的建立中发挥了工具性作用，而与此同时，国家也将人民教育成了公民。作者进而具体列举出，公民权问题在东亚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也呈现了不同的表现形态与斗争方式；最后又指出，由于该地区的公民权斗争还要处理全球化和社会内部的诸多问题，故而必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第三组的两篇文章，聚焦于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史。张勇讨论了梁启超和章炳麟在《新民丛报》和《民报》时期有关“道德”的论述。任公是二十世纪初各类革命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其有关“道德革命”的论述影响很大。太炎的独到之处则在于，他在主张政治（种族）革命的阵营中，率先提出了“革命道德”的问题，以为“道德与否”关乎革命之成败。而本文通过细致的辨析，认为任公有关“道德革命”的言论，与太炎关于“革命道德”的论说，存在着对应性的潜在关联。这中间，既有因据于不同阵营而相互攻驳的内容，也有因学术意见相异而做出的对立回应，甚而，更有因思路相似而殊途同归的结论。由此，也就反映出上世纪初的中国新知识界，都看出了在“革命与道德”间的两难，即以掀翻既有秩序和既定道德为目标的革命，却又必须以道德之心来施行之，否则就可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皮后锋和杨琥把眼光对准了民国初年严复、章士钊、马良等几位北大校长的更迭过程，认为这既是当时党派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辛亥前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斗争的延续，表现了革命党、立宪派、北洋集团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幕后较量。作者通过对于大量史实的爬梳，还原了围绕北大校长这一重要职位，各派政治势力所展开的激烈博弈，披露出政治斗争与文化教育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

第四组的两篇文章，聚焦于古代中国的绘画传统。朱良志以吴镇绘画

中的“渔父”主题,来讨论所谓“水禅”的美学和哲学价值。不同于只是从“隐遁”来理解渔父艺术的做法,作者认为,渔父艺术的核心精神当是“到有风波处寻无波,最危险处即平宁处”的“乐在风波”的人生智慧,包含了“无露无藏”、“大钓不钓”、“做‘任公子’”等方面,而这种道禅智慧超越了单纯作为“隐者”思想,强调了内在心性修养的重要。作者指出,在对待“终极价值”的问题上,吴镇这种师自张志和、船子的“水禅”传统,直接继承了南宗禅的精髓,否认了绝对依归和终极依靠的存在,否定了“家”和“岸”的确定性,而宣扬志在飘荡、不求归途的自在优游精神。肖鹰则围绕着“仿古与变法”这一矛盾,来探讨董其昌绘画思想所蕴藏的美学内涵。作者认为,董其昌不仅自觉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形式与意义、形似与真意、技艺与气韵等多重矛盾,还将气韵理论与自然美学自觉地结合起来,并在“当境方知”这一命题下,完成了传统绘画美学有关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追求。

评论栏中,阿兰·麦克法兰指出,西方社科理论范式的演变历史,显示了这类范式同政治经济状况的密切对应关系。作者指出,这一关系通常表现为:当经济和技术迅速发展,尤其当一种文明处于支配地位并进行扩张时,进步论和目的论色彩的理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对抗成为主题,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处于相对平等状态时,进步主导的论调就会式微。作者进而指出,二十世纪下半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冷战时期(1945-1965年);技术飞速进步和非西方(日本)崛起时期(1965-1988年);苏共解体和亚洲(中国)崛起时期(1989-2000年)。而每个阶段的理论范式,又准此可分为三大主题:自由的必然论,技术决定论和现代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领先论。但毕竟,每个理论的解释力都有局限,而这些理论间的相互冲突,又使整合它们相当困难,此外,由理论操纵历史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由此,对历史达到完全客观的认识,也就成为不可能的目标。然而,我们眼中注定只有自己的倒影吗?作者对此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一是基于考古学而诉诸昔年人工制品的权威,它们可以部分地免于流行理论的感染;其二是重读已渐遭遗忘的学术经典,它们的内容迥异于上世纪后半叶的流行话语。高峰枫指出,二十世纪福音书研究的一个重要走向是,

在研究耶稣这个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对于被前人忽视的政治因素详加考察,以矫正一味强调神学和道德的倾向,而英国学者布兰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奋锐党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研究之一。这种理论认为,耶稣与当时犹太人反抗罗马政府的激进运动关系紧密,并曾策划用武力来夺取耶路撒冷圣殿,这是导致他后来被捕与受刑的主要原因。本文概括叙述了布兰登的三部著作,并列举了他所提出的五项关键证据;尔后,又将西方学者对他的批评详加梳理,以求准确评价这种解释的缺陷和贡献。

讲坛/通讯一栏,发表了狭间直树在清华国学院的系列讲演之一,题为《梁启超思想的独立——〈清议报〉时期》。作者提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避难于日本,其思想亦尝“为之一变”,而这种变化的内在一面,正是其逐渐摆脱康有为笼罩的过程。围绕着这一主题,作者进行了三项考证:第一,还原了谭嗣同传记的出台经过,以及梁启超如何在此过程中,有意营造出“谭嗣同师事康有为”的印象;第二,梁启超主持《清议报》期间,曾将其加以改造;第三,谭嗣同的《仁学》经梁启超之手,最终得以完整地面世,但期间却多有细节修改,而此中的关键之处,恰是在谭与康关系上,又悄悄抹去了康的印迹。

最后要说的是,现在虽然是在写作“卷首语”,可这篇东西却只能留到最后来写,也就是说,只能等整本的期刊全都编定以后,才能在“强弩之末”的精神状态下,再进行这种走笔不能尽兴顺畅的写作。但即使如此,既然此间正是清华国学院,自己也就只有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地努力了,——既然本院的前贤早已有言在先:“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是啊,“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谨以静安先生此语,与仍愿为中国学术担起责任的诸君共勉!

刘 东

2013年4月16日补写于清华园立斋

执行编辑 何 恬(中国社会科学院)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通讯编辑 戴沙迪(马萨诸塞州立大学) 张 伦(赛尔齐·蓬多瓦兹大学)
蔡慧清(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冠南(道林学院)
赵 坚(常磐会学园大学)

助理编辑 刘 玮(中国人民大学) 郭金华(北京大学)
邱源媛(中国社会科学院) 彭姗姗(中国社会科学院)

投稿地址: 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文史室《中国学术》

电子邮件: dongliu@pku.edu.cn

或 ChinaScholarship@vip.sina.com

网 页: <http://chinascholarship.vip.sina.com>

订购地址: 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发行部

电 话: (010)63044891 83164425

目 录

卷首语	1
-----------	---

论 文

刘 东 伯林:跨文化的狐狸	1
简森·费雷尔 以赛亚·伯林与随笔政治	40
彭慕兰 区域、网络和对于“早期近代”东亚的研究	66
阿里夫·德里克 殖民主义·革命·发展——对亚洲东部政治 斗争中公民权问题的历史考察	87
张 勇 “道德”与“革命”——《新民丛报》与《民报》时期 梁任公与章太炎的“道德”交涉	113
皮后锋、杨 琥 新旧、政学之争——民初北大校长更迭风波 及其政治动因	147
朱良志 论吴镇的“水禅”	200
肖 鹰 仿与变 中国山水画的自然精神——以董其昌的 绘画美学为例	227

评 论

艾伦·麦克法兰 片段:时间观念与我们生活的世界	247
高峰枫 革命者耶稣:布兰登“奋锐党理论”评述	259

讲坛/通讯

狭间直树 梁启超思想的独立——《清议报》时期	274
------------------------------	-----

书评

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的民主》(刘玮)	287
约翰·多利斯:《品格的缺席:个性与道德行为》(田洁)	293
丁荷生、郑振满:《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刘永华 董乾坤) ...	301
罗柏松:《权力之境:中古中国南岳的宗教景观》(朱溢)	311
朱鸿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赵刚)	317
黄忠慎:《清代〈诗经〉学论稿》(陈才)	324
田安:《精制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 (马强才)	330
丁亚平:《中国当代电影史》(张慧瑜)	337
马克·伽马:《俄罗斯文学的在华翻译:三项研究》 (龙瑜宸)	343
周云龙:《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中国,1895 - 1949)》(何恬)	349

Contents

Preface	1
 Articles	
Liu Dong, Berlin: Cross-cultural Fox	1
Jason Ferrell, Isaiah Berli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ssay	40
Kenneth Pomeranz, Areas, Networks, and the Search for “Early Modern” East Asia	66
Arif Dirlik, Colonialism, Revolution, Development: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Citizenship in Political Struggles in Eastern Asia	87
Zhang Yong, “Morals” and “Revolution”: Discussion on the “Morals” between Liang Rengong and Zhang Taiyan dur- ing the Period of <i>Xinmin Series Newspaper</i> and <i>Minbao</i> <i>Newspaper</i>	113
Pi Houfeng / Yang Hu, the Struggle between New and Old, Politics and Scholarship: Change of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Its Political Motives	147
Zhu Liangzhi, Discussion on the “Shui Chan” of Wu Zhen	200
Xiao Ying, Imitation and Change: Natur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Aesthetic Ideology in Dong Qichang’s Painting	227

Reviews

- Alan Macfarlane, *Fragment: Concepts of Time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247
- Gao Fengfeng, *Jesus as a Revolutionary: Comments on*
 Brandon's "Theory of the Zealots" 259

Lectures/Correspondence

- Hazama Naoki, *Independence of Liang Qichao's thought—in*
 the Period of *Qingyi Newspaper* 274

Book Reviews

- John P.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Liu Wei) 287
- John M. Doris, *Lack of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Moral*
 Behavior(Tian Jie) 293
- Kenneth Dean and Zheng Zhenman,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n Plain(Liu Yonghua/Dong Qiankun) 301
- James Robson, *Power of Place: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 in Medieval China(Zhu Yi) 311
- Zhu Honglin, *Specul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ubstance of*
 Confucian Lea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Zhao Gang) ... 317
- Huang Zhongshe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Qing*
 Dynasty(Chen Cai) 324
- Anna M. Shields, *Crafting a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ajian Ji (Ma Qiangcai) 330
- Ding Yaping,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Zhang Huiyu) 337

Mark Gama, <i>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ree Studies</i> (Long Yucheng)	343
Zhou Yunlong, <i>Border-Crossing Imagination: Cross-Cultural Drama Study</i> (He Tian)	349

伯林：跨文化的狐狸

刘东（清华大学）

一、消极自由与当代中国

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过去以后，正是鉴于来自欧陆的历史决定论和价值一元论已给当代中国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也是鉴于这场“空前”却未必“绝后”的灾难的浓重阴影，人们便不能不向一个勇敢的先觉者表示他们迟到的敬意，而这位思想的英雄就是顾准，——他当年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最早领悟到了英美经验主义思想的魅力：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 年、1917 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 1000 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

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¹

显而易见,只要稍稍对比一下身在英国的以赛亚·伯林对于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的类似信条的概括,就可发现顾准这把对准“终极目标”的简洁明快的奥康姆剃刀,究竟是来自哪一条哲学路线:

他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生命本身,每日每时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另一天或另一种经历的手段。他相信,那些遥远的目标是梦想,对它们的信念是一种致命的幻觉;为了遥远的目标而牺牲现在,或当下的可以预见的未来,必然会导致残酷而徒劳的人类牺牲。他相信,在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里找不到价值,价值是由人创造的,并随世代的转换而变化,但仍然约束着那些据此生活的人们;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而绝对可靠的知识既是不可企及的,也是不必要的。他信奉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行动,和经由经验发现的真理;然而他倾向于怀疑,那些对普遍公式和定律、对关于人类事务的规则的信念,是一种非理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企图,企图摆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多样性,逃向我们优美幻想的虚假保障之中。²

接下来要说的是,就我本人的记忆所及,中国人真正较早接触到来自英伦的以赛亚·伯林的思想,那就应该是在八十年代末的一期《读书》杂志上。而即使把写作和发表所需的时间都算进去,构思那些文章的时候,也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大家应当都还记得,那期杂志上的头一篇,是甘阳利用了伯林《自由四讲》的台湾版,而以“消极自由”为口号,在为某种

1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民主与终极目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37-139页。

2 伯林为《往事与随想》英文版所作的序言,转引自马克·里拉、罗纳德·德沃金、罗伯特·西尔维:《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6-27页。